

20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
史论

许纪霖 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20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
史论

许纪霖 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许纪霖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4

ISBN 7-80148-775-3

I. 2… II. 许…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20世纪 IV. D66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251 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 100007

电话: 010-84094409

传真: 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5 字数: 518 千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定价: 3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编者序)

许纪霖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一百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大时代。

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一切都在变,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了一遍。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简单地讲,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关于前者,我在 2000 年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中,已经有所阐述,而本书的编选,则侧重于后者,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次大转型,以及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互动。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二,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100年前的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只剩下其无形的灵魂,不复其有形的躯壳。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只有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

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精英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边缘知识精英领导农民,进行了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断裂社会”的第二个涵义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到20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凋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社会分

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但“断裂社会”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多元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上的有序联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断裂社会”之中，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的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过，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的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得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断裂。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丁文江、张君勱、张东荪，怀着传统士大夫的梦想，力图通过言论和知识的力量，重返社会的中心，并希望将社会与国家通过西方式的改革，重新整合起来。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章太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则利用“断裂社

会”的缝隙，自居社会的边缘，反叛体制、反叛主流，在社会建制之外发动革命，导演了20世纪两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革命和社会大革命。最后，草根政治战胜了士大夫政治，边缘知识分子战胜了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列维坦里面，不再有社会，也不再有知识分子。

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当社会重新从国家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也重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很快地，一个世俗的工商社会崛起，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边缘化，重新变得微不足道。这一次，他们不是被国家颠覆，而是被社会本身颠覆了，确切地说，是被市场社会埋葬了重返中心的梦想。

无论重返中心，还是落入草根，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所谓的缙绅或游士只不过是士大夫精神的两面而已。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所要引入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不可能产生于四民社会，也难以在“断裂社会”中蕴育，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而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社会转型的制度化平台。

2005年元旦于丽娃河畔

目 录

“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编者序)	许纪霖	1
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	黄 平	1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余英时	13
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杜维明	31
关于士大夫的“二重角色”	阎步克	43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徐复观	63
中国知识分子	钱 穆	76
论“知识阶级”	费孝通	99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王汎森	107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罗志田	127
20 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杨国强	162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陈平原	176
20 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	桑 兵	203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张朋园	223
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舒衡哲	232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钱理群	285
文学界的出现	李欧梵	324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钱理群	343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

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章 清	364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谢 泳	393
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结果——中国知识分子在 50 年代的 经历探源	黄 平	407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许纪霖	426

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

黄 平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着工业化产生的，虽然追根溯源，可以从希腊罗马或春秋战国时代便找到这类现象的雏形。本文无意作详尽的历史探源，而只是力图概略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识别他们？他们的社会位置何在？为什么现有的一些知识分子理论各有所长又都不尽如人意？怎样的理论架构更有利于对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关系作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等等。

一 知识分子概念及其背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一词被用得相当广泛。但稍加观察，就不难看出，不同国度的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或描述，却又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即使在社会学家中，分歧也随处可见。

著名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 Shils)，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大量“消费”这些知识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1]这一定义是宽泛的，因为其认为即使原始社会也有知识分子，也因为其将诸如阅读(“消费”)过大量书籍或管理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囊括进去了。另有一些社会学家则不这般宽泛地使用知识分子概念。他们倾向于将其限制在以观念或思想的生产为职业的人的范围内，如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记者和高等院校的部分研究生。他们甚至把那些仅仅从事知识的应用的人，如工程师、建筑师、律师和大夫，也排除在外，更不用说只是“消费”知识或管理知识的人了。^[2]

更有甚者，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样来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仍嫌太泛。例如马克思·韦伯(M. Weber)就把知识分子仅限于那些因为其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

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3]路易斯·科塞(L. Coser)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4]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都向来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5]

在这些不同定义的背后，有一点是共同的：定义者们都自认是被定义者中的一员。也就是说，这都是些自我定义。^[6]对这些自我定义作简评之前，似宜先行追溯一番知识分子一词的产生过程。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最早见于1898年1月23日登在法国*L'Aurore*上的一篇文章。针对法国的一桩案件，一些文人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在其中表明他们对这一案件的肯定态度。从此，“知识分子”在法国被逐渐广泛地使用起来。不过，对上述案件持否定态度的右翼人士是在贬义上使用它的。对这些右翼人士来说，那些自认为代表了民族良知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是很可笑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根据自己在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建树而推出自己也因此就是民族良知的代表呢？譬如说，一个人凭什么因为自己对文学或数学有造诣或研究就宣称自己对政治问题因而也有裁决权呢？逐渐地，贬义也罢褒义也罢，在法国，“知识分子”一词便成了用来描述那些受过教育但又与传统和秩序相悖的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试图要么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要么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7]

“知识分子”19世纪末在美国的遭遇也与其在法国的处境很相似：它是一个贬义词。当时，“知识分子”被用来形容那些命运欠佳的“怪人”：他或者身为工人却又比大学毕业生更博学，或者出身显贵但拒不认同自己那个家庭，或者虽然受过教育却没能完成学业，或者有知识却无个性、有才华却没章法。那个时代的美国，甚至被认为是反知识分子的社会。“知识分子”的狼狈处境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改变。在大萧条年代里，似乎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变萧条为繁荣的超凡绝技。这一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它成了一个正面的肯定性词汇。^[8]

英国的情况同法、美迥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人学者都是在体制内生存并活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伯特兰·罗素(B. Russell)，根本就不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也不愿意别人如此称呼自己。在牛津—剑桥精神的熏陶下，人们逐渐养成了对社会现实的保守习惯，他们也确实在现实中享有许多特权和声誉。英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后来被称作知识分子的那些人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而没有分化出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诚如当今英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社会学专家阿兰·斯温吉乌德(A. Swingewood)所分析的，英国社会所特有的保守主义和对社会变迁的敌视，非常有逻辑地

滋生出这样一种环境，在其中知识分子总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去发挥作用的。^[9]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知识分子仍然在根本上对自己的社会秩序是认同的。^[10]

反观前述社会学家们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歧见，似乎可以说，希尔斯式的定义的确略嫌过宽，不便于对知识分子现象作历史和社会的把握；而科塞及法兰克福学派式的限制却又让人感到过窄了；且带有把知识分子理想化的色彩，更何况，仅仅依据某种心理特征（例如批判精神）去划定某种社会成员，也欠充分。

二 知识群体：特定社会的产儿

这倒不是说，某些知识分子就不能以批判精神为特征，更不是说，从来就没有过某些知识分子以其批判精神而凝聚、而著称的社会。彼得·安德森(P. Anderson)在论及英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传统时说过，“英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知识群体”^[11]。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群体呢？

“知识群体”(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是别林斯基(V. G. Belinsky)等俄国、波兰人在1840年代首先使用的。^[12]本来，一个概念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不在于它首先被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发明、使用，而在于它确实概括了一种社会现象。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波兰等经济、社会都较西欧落后的国度里，的确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知识分子类型：他们受过西方教育但却身在非西方的环境中，他们虽有知识却没什么财产，他们在精神上比贵族还高傲但并未获得上等的职业和显赫的地位，他们既远离社会的普通民众又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虽然后者也受过一流教育。把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起最明显的东西，便是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对现行体制的批判。这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但经济上是落后的，而且政治上也往往是专制的。^[13]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被叫做知识群体的原因。由于他们以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著称，有许多时候也被称为“批判性的知识群体”。当这样的知识群体企图将其批判精神化作实际运作从而引出激烈的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甚至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在俄国，从十二月党人到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从同盟会到共产党，都是如此。可见，在政治倾向上，知识群体除了对现状的批判外，也并非铁板一块。

由此说来，“知识分子”和“知识群体”在概念上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些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思想、观念的创造者个人，后者则是身在经济、社会都较为落后的环境中，但又接受了西方形形色色的观念，并因而对现存秩序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群体。

毋庸赘言，在众多的社会学家中，并非都如此一致地区分和使用知识分子与知识

群体概念,有的人就把它等同看待,也有人考虑到1917年后俄国及世界的巨大变化,转而认为在当今知识群体应用于科技人员总体,而知识分子才是关心时事、批判现实的。^[14]

综合以上诸说,本文主张把知识分子视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频繁使用抽象符号来创造关于人及其环境的思想,或表述他们对于人及其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生活内容。这些人可能批判现实也可能认可现状,可以被社会容纳也可以被公众嘲讽,也许来自上层社会也许出身平民家庭,或者有大学文凭或者没有大学文凭……

而知识群体,则仍在古典的意义上使用为宜,或者,考虑到科技人员在现代社会也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不妨将古典的知识群体称为批判性知识群体,而把科技人员叫做技术性知识群体。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社会一定皆有知识群体或批判性知识群体,它只是较为落后的社会同现代工业社会撞击后的产儿。

三 曼海姆及其知识分子“自由漂游”论

如果说,在知识分子概念上社会学家们有着诸多不同见解的话,在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框架上,各执己见甚至互不相让的现象就更明显了。在这些不同理论中,卡尔·曼海姆(K. Mannheim)的知识分子“自由漂游”论堪称最早的经典学说之一。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曼海姆在他1929年发表的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理论。曼海姆认为,尽管知识现象不应只被视为人们智力活动的产物,而更重要的是其也应被看作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来的成果,但从事知识的创造、阐释的知识分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们才能综合不同社会集团的经验并创造出叫做知识的东西来。他借用了阿尔伯特·韦伯(A. Weber)的说法,把知识分子叫做“自由漂游”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的。”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们“可以归附到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阶级中去”,也“可以持有任何阶级的观念”或“综合所有阶级的观念”。^[15]

在曼海姆看来,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有两大特质:同质性与异质性。同质性意指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者,而正是教育使知识分子彼此认同并超乎各个社会阶级,并因而有能力动态地综合各个阶级的不同政治观念;异质性正相反,它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极度不一致,他们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归属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

同时具有这样两种正好相反的特质的知识分子，何以见得是自由漂游的呢？曼海姆论证道，首先因为知识分子来自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其次也因为他们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最后还因为他们不像工人或商人那样直接为其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关系所束缚。

仔细分析这三条原因，会发现其中每一条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首先，人们的社会身份、地位同他们的出身、根源并不是同义词，也不必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者，但根据一个人或一种人来自其他阶层、阶级而推说他或他们是自由漂游来的，却似欠有力。其次，并非只有知识分子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这是用不着多费笔墨便可明白的；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为别的集团效力就一定因为其是“自由漂游”的呢？最后，不像工人或商人般地直接为经济生产所束缚的人，还有政府官员、军队将士、警察、法官等等，谁也不会认为他们也是自由漂游的。不被经济束缚，可以被政治、军事、法律乃至种族、性别、宗教束缚。

回到知识分子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来。受教育在现代社会已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特权了，从政府官员、法官律师，到企业家、银行家，以至现代工人、农民，许多也都有幸受过教育。进一步说，教育很难说是超社会的，受教育者又怎么进行超社会的综合呢？就在曼海姆写《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时候，在他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就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同质性。当时有许多人支持纳粹，但柏林政治学院的一些人仍然是自由派人士，而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还集聚了一批激进的“左”倾分子！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全方位综合能力，更多地不过是曼海姆的希望和理想。

从知识分子是否自由漂游的角度考虑，异质性比同质性更有意义，可是从曼海姆所论述的异质性本身，只能看出知识分子分属不同营垒，还看不出那是他们自由漂游的结果。不止于此，从逻辑上说，曼海姆论述的知识分子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正好是相互矛盾的。

曼海姆看来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自由漂游”说有欠完善，故他每每用斜体的相对二字去限制他那“自由漂游”。

在这里，笔者并非想要完全否认相对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在西欧，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市民社会的存在，是文人、艺术家、编辑、记者，以及医生等等得以存活的条件。学校、报馆、剧院、书店、教堂、医院，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存在并起作用的。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受到政治社会的直接左右。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相对说来，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职业、生活地点乃至学派和倾向。

但我们不应忘记有过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如英国新教初期和德国纳粹时代，市民社会受到政治国家粗暴干涉，知识分子也被迫牺牲了他们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西

欧、北美乃至世界各国的历史,自近代以来,不只是市民社会的历史,它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并发展的历史。民族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多少自由漂游的天地。〔16〕

四 知识分子: 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

与曼海姆的理论取向相反,则有把现代知识分子看作一个新阶级的种种尝试。尝试之一,是在帕累托(V. Pareto)、米歇尔斯(R. Michels)等人的精英理论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宣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中,实际发生的,并不是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政变”。在那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激进知识分子用军事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并从而使自己成了新的统治者。〔17〕这一尝试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历史的。尝试者们也的确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一尝试也从南斯拉夫前领导人吉拉斯(M. Djilas)的名篇《新阶级》一书中得到了佐证。二十年后,匈牙利的两位社会学家进而在西方出版了《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用更新的材料、更细的分析去说明在东欧和苏联知识分子自50年代起如何与官员融合并进而组成为新阶级的。〔18〕

《新阶级》和《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两书,暂撇开其长短不论,主要论及的是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变革(革命或“知识分子政变”)以后的政治结构及知识分子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根据这些社会的变革是由知识分子参与并领导的而认为变革本身不过是场“政变”,就如发现变革后的社会许多官员是由知识分子担任的便得出知识分子已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样,是不够充分的。

相比之下,阿尔温·古尔德纳(A. Gouldner)的尝试和包含在其中的理论,显得高明和精细得多。1979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将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他在书中将西方和那时的苏联集团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都划入一个被他叫做“文化资产阶级”的名下,认为这个阶级在两种社会中都正在变为统治者。

知识分子在这两种不同体制中之所以都被古尔德纳划为一个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分享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因为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一样的。所谓相同的文化背景,古尔德纳指的是一种被他称为“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东西。这是一套在知识分子中历史地形成的不成文规则,其关注于如何使思想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且这一正当性并不求助于当局的权威。这套规则所必然引出的那些自觉自愿的言论,完全是建立在争论基础上的。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旨在寻求正当性的特别的话语行为。它是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和技术性知识群体所共有的。

为什么说这些不同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呢? 古尔德

纳认为,以批判性话语文化为背景的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分配。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又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古尔德纳把这种资本称为“文化资本”,占有这一资本的人因此也叫“文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文化资产阶级”无论在西欧、北美还是在东欧、苏联,都正在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因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正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19]

古尔德纳的论证,给人以旧瓶装新酒的感觉,陈套中有着新意。严格说来,他论述的批判性话语文化和文化资本都是有待完善的。“批判性话语文化”无疑蕴含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特点,其一般说来是为非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但它舍去了存在于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重要差别。譬如说对所谓正当性的理解,就可以有很大出入。至于说批判性,现在有很多社会学家都意识到,这在技术性知识群体中,至少就社会现象而言,是比较缺乏的。甚至可以假设;技术的一个内在特点,就是把人(技术性知识群体)训练得稳重、精细、保守,从而使他们的工作往往更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

“文化资本”概念,就更显粗糙。众所周知,货币资本是可以转移的。它的持有者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或自己对市场需要的预测来决定往钢铁或石油或别的什么领域投资。但知识却不是这样,一个学土木建筑的学者或学生怎么把他的土木建筑知识“投资”到纺织业或服装设计业中去呢?再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货币资本的持有者(股东)大可不必自任经理,直接参与管理过程。但知识分子是不能如此这般地使自己同其“文化资本”分离的,他没有代理人,若要运用知识或“文化资本”,他就必须事必躬亲。既然如此,知识还能当作资本吗?

最重要的还在于,知识、科技等在现代社会的确越来越重要,但知识分子或者说掌握了知识、科技的人是否因此就成了统治阶级,尚属疑问。科学的重要性也可看作劳动力的重要性,即是说,现代社会的劳动力,越发需要由掌握了科技的人来担当。因此从逻辑上似乎也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犹如古代的农奴、中世纪的农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样,不过是当时的主要劳动力而已。

在古尔德纳的“文化资产阶级”理论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忽略:西方与苏联社会在体制上的区别。后者中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因而知识在那里便无所谓是否成了资本。如果苏联体制中的知识分子也正成为统治阶级,则一定不是因为他们占有“文化资本”。^[20]

五 异质性: 知识分子的分化

古尔德纳与曼海姆的理论取向正好相反。若对这两种理论本身也作知识社会学

的分析,就不会对它们如此分明的泾渭感到惊异。曼海姆在写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年代,如前已经提到的,正是德国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同政治派别的时候,这对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归属到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集团因而是自由漂游的,无疑有着很大影响。古尔德纳则看到了“二战”以来东西方社会中科技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由此他认定知识分子正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如上面所概略分析的那样,两种相反的取向各有所长,又都有所失。它们的一个共同不足之处,在于都试图用一个模子去让各类知识分子就范。

与这类用一个模子去看知识分子的取向不同,安东尼·葛兰西(A. Gramsci)在他的铁窗生涯期间所写下的那些札记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机的和传统的。前者系作为每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该体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和霸权而存在、而汇聚、而发挥作用;后者则指每一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部分曾经属于前一社会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可能已融入现存体制中)。葛兰西之所以称他们为传统知识分子,是因为从传统上说,那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文人、学者才是被公众当作“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哪怕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中有机知识分子的成员。^[21]

葛兰西的思路是颇具启发性的。若用他的划分方法去看曼海姆和古尔德纳的理论,则是否可以说,曼海姆所刻画自由漂游的人,正是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传统知识分子,而古尔德纳所描绘的新兴统治阶级成员,不过是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已。换言之,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可以自由漂游,亦非全部知识分子皆成了统治阶级成员。知识分子是分化的。

这种分化很明显地不仅是曼海姆所看到的那种异质性,即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分野,更不只是古尔德纳等人注意到的现象,即他们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的分工。而更重要的,它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化的认识的开端。并且,由于看到了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间的渗透或位移,即部分前有机知识分子已“沦为”传统知识分子,某些传统知识分子可汇入未来的有机知识分子,它提示了一种动态分析的可能性。

葛兰西的札记,却又是未加整理的。他更不可能做什么经验研究去验证他的思想。他对知识分子的阐述,主要是依据西欧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了他对未来的想象。在划分上,连他那两个概念在字面上也明显是不对应的。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思想中原生的独到之处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正如曼海姆、古尔德纳也给了我们极大的思维空间一样。